

《儒林外史》 与江南士绅生活

顾鸣塘 著



商務印書館

《儒林外史》 与江南士绅生活

顾鸣塘 著

商务印书馆

2005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儒林外史》与江南士绅生活/顾鸣塘著.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ISBN 7-100-04422-7

I. 儒… II. 顾… III. ①儒林外史—文学研究
②绅士—研究—中国—清代 IV. ①I207.419②
D691.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31945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RÚLÍNWÀISHǐ Yǔ JIĀNGNÁN SHĪSHĒN SHĒNGHUÓ

《儒林外史》与江南士绅生活

顾鸣塘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4422-7/K·843

2005 年 6 月第 1 版

开本 880 × 1230 1/32

2005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12 插页 2

印数 4 000 册

定价: 21.00 元

本 书 为

国家文科基地上海师范大学中文学科点项目

序

何满子

对于任一具体作品,文学批评的任务是通过解读文本揭示其美学的历史的价值,因此,文本解读的精确度和深刻度决定文艺批评的质量。文本解读可以从各种角度切入:或从创作主体的风格特征、人生关注、感情态度、创作方法的剖析入手;或从创作对象即形象中所蕴涵的生活的诸多方面,现实的和历史的各层面的阐发着眼。取径虽然多方,约而言之却不外两途:一是孟子所说的“以意逆志”法,即从作家所诉求的种种情状追溯他所钟情的人生问题及其所面对的客观世界;一是伯乐《相马经》所说的“按图索骥”法,即从作品所以产生的社会环境和人文状貌论证作家如何将生活转化为艺术。这两种路数自然会有交叉,有重叠,但其批评建构和基本倾向却是显然有所区别的。本书作者顾鸣塘所择取的为后一种路数。

这种方法必须对产生作品的社会状况了然于胸,论证中要掌握大量材料乃至精确的统计指数,才得以阐明制度性的和运行性的社会人文生态,进而观照鉴别对象的形象合理性、真实性和合于美学比例的程度。这种方法的优点是,可以排除游谈无根和向壁逞臆;但稍一不慎也易走入误区,因耽爱资料而失于节制,陷入烦琐考据和议论枝蔓;或醉心于从资料去发微索隐,于是便从别一岔道与游谈臆测会合。在《红楼梦》研究领域,人们对这种畸形现象见得太多了。

2 《儒林外史》与江南士绅生活

令人欣喜的是,本书作者避免了烦琐和枝蔓,也不分心于比附与索隐。本书所论证和据以论证的材料,是环绕在《儒林外史》及其作者吴敬梓周围的原生态,全书紧扣着小说的形象,论列了各色人物的活动空间,从而疏通了小说形象和生活实际之间的关联和呼应。既以人生实况印证了小说人物和情节之所以如此如彼的因由,也时刻在显示制度性和运行性的社会人文状貌时,以小说人物的行为和言谈作出反证,使艺术与人生互相映衬而彼此都得以彰显。由于本书所提供的当时社会环境和人文状貌的完备和翔实,纲目毕具,遂使本书不仅大有裨于解读《儒林外史》,而且也使本书自身成了清代早中期社会性质的百科式的论著。

本书论证的重点也和吴敬梓小说所主诉的内容同向。书中第三章关于科举取士制度的程式、运作,以及竞逐于这一制度下的士子心态的论叙,是全书篇幅最多、情况最周备的部分;单就这一章言,割取出来便可成一本介绍科举制度的专书。吴敬梓嫉视科举和时文,甚于别的各种社会弊害,显然是因为作为社会文化承担者的儒林群体,统统受这个制度的牢笼和荼毒,人格被扭曲,因而导致了文化的偏枯和颓败。吴敬梓将此视为一切文化弊病乃至社会弊害的总根而给以辛辣的讽刺。正是儒林中人的颓败以及远不止是儒林的颓败,使吴敬梓敏锐地察觉出传统文化的深重危机。《儒林外史》的深层内容,便是从这大群可笑可悲的人物活动的背后所透露出来的社会—文化危机。

吴敬梓是封建末世察觉了传统文化危机的第一位智者,其历史作用如用世界范围的杰出人物来比拟,则正像欧洲中世纪意大利诗人但丁之提早发出了呼召文艺复兴的先声。吴敬梓比后起的龚自珍提早了一百年发出了“万马齐喑究可哀”那样的沉重叹息。

然而,在吴敬梓忧心忡忡地公心讽世时,中国大地上的秀才们、

官员们、绅士们、清客们、斗方名士们，优倡皂隶以及上上下下各阶层、各行业的芸芸众生，正如《儒林外史》所描写的，却在扰扰攘攘、孜孜矻矻、晕头转向、煞有介事地奔走着他们的功名、权位、浮名和各式各样的利益。社会在沉沦，在陵夷，却仍如常地运转着，和往昔毫无异样。本书所提供的，便是这个社会图景，它的风貌、风习，包括制度性的和运行性的诸种色相。

本书作者顾鸣塘嘱我作序，因述读了原稿后的感受如上。

2004年6月

目 录

导言	1
第一节 江南的区域概念	4
第二节 士绅阶层的含义及构成	8
第三节 《儒林外史》时代的江南士绅	9
第一章 从《儒林外史》观察江南士绅的婚姻与家庭	20
第一节 婚姻的缔结与礼俗	20
一 婚姻的缔结	21
(一) 门当户对	21
(二) 财婚对门第婚的冲击	29
(三) 赘婚	35
(四) 纳妾制度	39
二 婚姻礼俗	49
(一) 订婚与主婚	50
(二) 六礼	52
第二节 家庭关系	58
一 夫妻关系	58
二 父子关系和兄弟关系	64
第二章 从《儒林外史》透析江南士绅阶层的经济状况	71
第一节 江南士绅的收入	71

2 《儒林外史》与江南士绅生活

一 出仕的收入	71
(一) 京官的收入	74
(二) 地方官的收入	78
二 担任幕僚或清客的收入	81
(一) 幕僚	81
(二) 清客	92
(三) 总管	92
三 教学的收入	92
四 行医的收入	100
五 经商的收入	102
六 编选时文的收入	109
七 润笔的收入	114
八 其他不稳定的收入	126
(一) 堪輿及占卜、星相	126
(二) 干犯法律	127
(三) 受赠	129
九 官费学生的收入	131
第二节 物价与支出	134
一 物价	134
(一) 银与钱	134
(二) 米价	138
(三) 其他物价	141
二 支出	143
(一) 住	143
(二) 食	147
(三) 茶	150
(四) 衣饰	151
(五) 出行	152

(六) 婚丧费用	153
第三章 《儒林外史》与江南士绅的科举生涯及心态	159
第一节 应试	161
一 童试	161
(一) 应试对象	161
(二) 考试过程及内容	163
(三) 童试中式后的优待与尴尬	171
二 岁考与科考	176
(一) 岁试	177
(二) 科试及录科、录遗	180
三 乡试与会试	182
(一) 乡试应试对象	182
(二) 乡试的考官及应试日期、地点和过程	188
(三) 会试、复试及殿试	193
(四) 乡试、会试的内容	195
(五) 乡试、会试的中额	198
第二节 科举考试中的舞弊现象	203
第三节 科举制度下的士绅心态	210
一 中式后的狂喜和屡试不第后的失落感	210
二 因科举而派生的迷信心态	217
(一) 科举考试中的偶然性	217
(二) 迷信风水与停丧不葬	220
(三) 对梦兆及占卜星相的迷信	228
第四节 与科举制相关的活动——时文的编选、 刻印与发行	235

4 《儒林外史》与江南士绅生活

第四章 《儒林外史》所涉及的江南士绅的

文化娱乐生活与交游	246
第一节 诗会及同道人士间的交往	246
第二节 观赏戏曲及与戏子的交往	259
一 观赏戏曲	260
二 与戏子们的交往	262
三 戏曲创作	269
第三节 狎妓及与青楼女子的交往	271
第四节 出游寄寓及与僧道人士的交往	285
第五节 与商贾人士的交往	293
第六节 居住环境及市隐心理、回归心理	307
一 江南士绅的居住环境	307
二 江南士绅的市隐心理与回归心理	316

第五章 《儒林外史》所反映的江南士绅的学术活动

第一节 《儒林外史》时代江南地区学术界概况	321
第二节 江南士绅的家学与学术交流	332
一 江南士绅的家学传统	332
二 江南士绅的学术著述与交流	338
第三节 吴敬梓的经学观	343

参考文献与书目

后记

导言

吴敬梓是一位传统文化学养极为丰厚、理性思维最为出众的白话小说作家,然而相对于其他古典文学名著,对《儒林外史》以及作者的研究呈现的是较为冷落的局面。近几年的相关论文和专著,在前辈学者奠定的基础上,在深度上大有拓展,其成就是不言而喻的,然而还有忽略的层面,即虽然也提出此书是第一部反映知识分子的长篇小说,也涉及了对《儒林外史》和那个时代士文化的研究,但一般都从其思想渊源、政治倾向等方面加以探讨,较少涉及物质生活以及与之相对应的精神生活层面。

其实,在我国小说史上,《儒林外史》是一部完全摆脱了传奇性质,表现平常生活的小说,是一部展示中国 18 世纪前后江南士绅生活及深层士文化的小说。吴敬梓对生活有着深入的观察与深刻的思考,这种观察和思考,是以知识分子的生活为中心,进而涉及吏治、教育、民生等广泛的社会问题,从而揭示了封建社会晚期腐败和没落的趋势。正因为知识分子问题本身具有丰富的现实内容和巨大的历史深度,所以吴敬梓对知识分子这一题材的深入开掘,必然会涉及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和层面。吴敬梓对他那个时代士绅阶层的婚姻家庭、收入支出、读书科举、文化娱乐、学术创作、交游通好等状况及相应表现出来的心理状态极为熟悉,了然于心。恩格斯认为,“《人间喜剧》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

2 《儒林外史》与江南士绅生活

史”，并言，“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① 在这方面，《儒林外史》所起的作用，何尝不是如此。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特别标举《儒林外史》，以提醒治史者注意汲取小说中所能提供的史料：“《儒林外史》中胡屠户奉承新举人女婿，固非事实也，然明、清间乡曲之人一登科第，便成为社会上特别阶级，此却为一事实。此类事实，往往在他书中不能得之，而于小说中得之。须知作小说者无论冥想至何程度，而一涉笔叙事，总不能脱离其所处之环境，不知不觉遂将当时社会背景写出一部分，以供后世史家之取材。”^② 海外一位研究中国小说史的著名学者则从文学艺术史的角度关注到了这一点，他说：“如果吴敬梓没有成为小说家，我们也就看不到他对周围社会生活栩栩如生的艺术再现了，看不到由《儒林外史》给我们保存至今的、那早已消逝了的十八世纪的中国社会风俗了。”^③ 本文所关注的正是吴敬梓所生活和所描写的那个时代江南士绅阶层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即所谓的“文学生态”。因为正是当时这种文学生态，为吴敬梓创作《儒林外史》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为我们解读《儒林外史》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鲁迅先生认为，自《儒林外史》出，秉“公心讽世”之旨，“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④，而“‘讽刺’的生命是真实”^⑤，其具体表现

① 《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1888年4月初）》，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462、463页。

②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第四章《说史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③ [美]夏志清著，胡益民等译：《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52页。

④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三篇，《鲁迅全集》第9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20页。

⑤ 鲁迅：《什么是讽刺？》，《鲁迅全集》第6卷，第328页。

即在于《儒林外史》所描摹的人物和环绕他们的环境世态之真实可信,全无“辞气浮露,笔无藏锋,甚且过甚其辞”^①之弊。吴敬梓认同“美刺说”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温柔敦厚”的诗教,他不仅将其作为方法运用于研究《诗经》,而且还作为一个创作原则运用于《儒林外史》的构思和写作。《儒林外史》所塑造的士人都是有血有肉、生活在我们中间的人物,不仅当时“乃觉日用酬酢之间无往而非《儒林外史》”^②,其实今天也还是,所以难以以正面反面来截然区分其中人物。正因为《儒林外史》所塑造的各类士绅有着高度的现实主义意义,本书的研究也就有了最可靠的依据。本书注重的是文学史研究中的“历史还原”,重点放在尊重“文学生态”事实上,并认为:当我们“书写”文学史,或描述一个时期的文学发展的面貌时,以及对一个时期的文学现象进行价值判断时,应该对这一时期的文学生态及其特点有一个深切的把握,这样才能避免为了某种预设的目的,尤其是在价值认知层面的预设目的,而不惜“改写”历史本身。

本书既注意汲取以往的研究成果,又不为其所囿,试图在事实认知的基础上尽可能真实地还原历史,出入于文、史、哲(包括经学),通过史学、社会学与文学的相互渗透和沟通,以《儒林外史》为基本材料,综合吴敬梓的生平以及他的其他诗文创作,采用相关的史志记载中那些最足以说明问题的材料,实事求是地进行综合的考察,并相应采取数理统计的方法,以分析个案(个人和家庭)入手,尽可能以立体交叉的方式,全方位深层次地来研究清代康熙乾隆时期江南士绅阶层的生活方式和心理状态,进而阐明那个时代江南地区文化的生态环境。

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八篇,《鲁迅全集》第9卷,第282页。

② 卧闲草堂本第三回总评。本书所引《儒林外史》原文及评语均据李汉秋辑校之《儒林外史》会校会评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

第一节 江南的区域概念

江南佳丽地，金陵帝王州^①。

江南，顾名思义应当是长江以南地区的统称，但各时代的含义有所不同：汉以前一般指今湖北江南部分和湖南、江西一带。唐代江南道为贞观十道之一，开元二十一年（733年）分为东、西两道：东道治所在苏州（今江苏省苏州市），辖境相当今江苏南部和浙江、福建两省；西道治所在洪州（今江西省南昌市），辖境相当今湖南洞庭湖、资水流域以东和东道以西地域。宋代江南路为至道十五路之一，治所在江宁（今江苏省南京市），天圣八年（1030年）分为东、西两路：东路治所在江宁，西路治所在洪州。清顺治二年（1645年）改明南直隶置江南省，治所在江宁府（今江苏省南京市）。清叶梦珠《阅世编》：

江南故为南京直隶卫、府、州、县，自顺治二年改为行省。……顺治季年，因苏、松赋重，特分江宁及苏、松、常、镇五府属右藩，而驻扎于苏州；左藩则辖安、徽等九府，徐、和、滁、广四州，驻扎省城。^②

清法式善《清秘述闻》载：“康熙五年丙午科乡试。……福建考官：编修吴国对，字玉随，江南全椒人，戊戌进士。”又：“山东考官：兵科给事中吴国龙，字玉驊，江南全椒人，癸未进士。”^③按，吴国对即吴敬梓曾祖，清顺治戊戌十五年（1658年）戊戌科探花；吴国龙为国对幼弟，明崇祯十六年（1643年）癸未科进士。《红楼梦》第十三回，“江南江宁府江宁县监生贾蓉”一句中的“江南”，与《清秘述闻》所说“江南”都

① 谢朓：《谢宣城集·鼓吹曲·入朝曲》。

② 叶梦珠：《阅世编》卷3“建设”，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

③ 法式善：《清秘述闻三种》卷2，中华书局1982年版。

是指的江南省。清康熙六年(1667年)分置为江苏、安徽两省。《清朝通志》:

江南江苏省(原夹注:初为江南省,康熙元年分设安徽巡抚,六年定为江苏、安徽两省),所属府八、直隶州三、厅一。江宁府,省会。

江南安徽省(原夹注:初为江南省,康熙元年分设安徽巡抚,六年定为安徽省),所属府八、直隶州六。安庆府,省会。^①

但此后仍习惯上称这两省为江南。如《清实录》“康熙十六年六月癸丑条”：“礼部题：前经九卿议准御史程文彝疏请本年添行乡试。今查直隶、江南、浙江三省贡监数多，应各遣官考试。”

以上是江南行政区域划分的历代沿革，而在明季以来人们的概念中，江南却有着狭义和广义之别。最狭义的江南至少包括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之地。清翁澍《具区志》和钱泳《履园丛话》卷4《水学》亦说是七府，或七府一州^②；清康熙帝则将这七府列为江南的一个地区：“江南省之苏松常镇及浙江省之杭嘉湖诸郡。”^③梁绍壬《两般秋雨盒随笔》也认为从物产、气候、民情来看，七府只是一个相同的小区域：“苏松邻壤，东接嘉湖，西连常镇，相去不出三四百里，其间年岁丰歉，雨旸旱溢，地方物产，人工勤惰，皆相等也。”^④清嘉道间两江总督梁章钜在《浪迹丛谈》卷5《均赋》中特地引梁绍壬之语以示赞同。有人将宁（应天—南京）列入，则为江南八府，亦有把徽州，或把宁波、绍兴列入之说。而广义上的江南则包括更大范围，如吴中

① 《清朝通志》卷29《地理略·疆域二》，商务印书馆1955年版。

② 钱泳：《履园丛话》卷4《水学》“水利”条：“盖江南自田，古为下下，今为上上者何也？……今以苏、松、常、镇、杭、嘉、湖、太仓推之……”，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③ 《清实录》，“康熙四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上谕”，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④ 梁绍壬：《两般秋雨盒随笔》卷4“三江赋重”条，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孚《商贾便览》卷2《江南省》：“东界大沧海岸，西界河南固始，南界江西乐平，北界山东滕县，东南界金山海滨，西南界湖北黄梅，东北界山东日照，西北界河南商丘。”^①

当代学者对江南的界定也是众说纷纭，从未达成共识。通检现行明清江南区域史研究论著对江南的界定，代表性的有如下几种：(1)“历史上通称的‘江南’，主要是指长江三角洲地区，即明清时代的苏松常镇杭嘉湖七个府所属的，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三角地带。”^② (2)“狭义的江南和太湖流域应以苏南的苏、松、常和浙北的杭、嘉、湖等六府最为合理。”^③ 江南“是指长江以南属于江苏省的江宁、镇江、常州、苏州、松江各府及太仓直隶州，以及浙西的杭州、嘉兴、湖州三府所属各县”。^④ (3)江南市镇分布在应天、苏州、松江、常州、镇江、太平、宁国、池州、徽州、杭州、嘉兴、湖州、绍兴、宁波、金华诸府^⑤。(4)明代的江南包括南直隶十四府四州，浙江布政使司十一府，江西布政使司十三府。清代则是江南省(顺治二年，即1645年，改南直隶为江南省；康熙六年，即1667年，始分设江苏、安徽两省)、

① 转引自陈学文：《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② 洪焕春、罗仑主编：《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③ 陈学文：《明清时期太湖流域的商品经济与市场网络》。

④ 刘石吉：《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李伯重在《江南的早期工业化》一书中也说：“就明清时期的情况而言，江南地区的地域应限定在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应天)、杭州、嘉兴和湖州八府以及由苏州府析出的太仓州这八府一州组成的地区。这一地区亦称长江三角洲或太湖流域，总面积大约4.3万平方公里，在地理、水文、自然生态以及经济联系等方面形成了一个整体，从而构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经济区。”

⑤ 樊树志：《明清江南市镇探微》附录列表所示江南市镇，复旦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